

郭预衡 著

中國散文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郭预衡



文史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散文史总目

序言

上册

- 第一编 先秦
- 第二编 秦汉
-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

中册

- 第四编 隋唐五代
- 第五编 宋辽金元

下册

- 第六编 明代
- 第七编 清代

下 册 目 录

第六编 明 代

第一章 概论	3
第二章 明代初期	15
第一节 初期之文(一)	16
一、宋濂	16
二、王祚	28
第二节 初期之文(二)	32
一、刘基	33
二、高启	39
第三节 初期之文(三)	44
一、苏伯衡	45
二、方孝孺	49
第三章 明代前期(一)	55
第一节 三杨台阁之文	55
一、杨士奇	56
二、杨荣	60
第二节 三杨同辈之文	64
一、金幼孜	64
二、王直	68
第三节 其他阁臣之文	73
一、解缙	73

二、于谦	78
第四章 明代前期(二)	83
第一节 东阳之文	83
第二节 东阳门下之文	87
一、邵宝	88
二、罗玘	91
第三节 东阳前后之文	95
一、吴宽	95
二、程敏政	99
第五章 明代中期(一)	103
第一节 讲学诸子之文	104
一、陈献章	104
二、王守仁	108
三、罗洪先	114
四、杨慎	118
第二节 弘治诸子之文	123
一、李梦阳	124
二、何景明	128
三、康海	133
第三节 吴中诸子之文	137
一、祝允明	138
二、唐寅	143
三、文征明	146
第六章 明代中期(二)	151
第一节 嘉靖诸子之文(一)	151
一、李开先	151
二、唐顺之	156
三、王慎中	161
第二节 嘉靖诸子之文(二)	166

一、李攀龙	166
二、王世贞	171
三、宗臣	176
第三节 嘉靖诸子之文(三)	181
一、归有光	181
二、茅坤	187
第七章 明代后期	193
第一节 万历诸子之文(一)	194
一、何心隐	194
二、李贽	199
第二节 万历诸子之文(二)	204
一、徐渭	205
二、汤显祖	211
第三节 万历诸子之文(三)	219
一、陈继儒	219
二、王思任	224
第四节 公安之文	229
一、袁宗道	229
二、袁宏道	235
三、袁中道	241
第五节 竟陵之文	247
一、钟惺	248
二、谭元春	253
第八章 明清易代之际	259
第一节 易代之文(一)	259
一、张溥	260
二、艾南英	264
第二节 易代之文(二)	267
一、陈子龙	268

二、夏完淳	273
三、张煌言	276
第三节 易代之文(三)	279
一、张岱	279
二、朱之瑜	283
第九章 余论	289
第一节 制义之文	289
第二节 游记之文	295
第三节 笔记之文	302
一、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	302
二、焦竑的《笔乘》	304
三、田艺蘅的《留青日札》	305
四、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	307
第四节 传记之文	309

第七编 清 代

第一章 概论	319
第二章 清代前期(一)	330
第一节 易代学人之文(一)	331
一、黄宗羲	331
二、顾炎武	338
三、王夫之	344
第二节 易代学人之文(二)	350
一、王猷定	350
二、傅山	355
第三节 易代学人之文(三)	360
一、归庄	360
二、周容	366
第三章 清代前期(二)	373

第一节 易代文人之文(一)	374
一、钱谦益	374
二、吴伟业	380
三、龚鼎孳	385
第二节 易代文人之文(二)	390
一、李渔	390
二、尤侗	394
第四章 清代前期(三)	401
第一节 易代文人之文(三)	402
一、侯方域	402
二、魏禧	409
三、汪琬	415
第二节 易代文人之文(四)	421
一、施闰章	421
二、朱彝尊	426
第五章 清代前期(四)	431
第一节 易代文人之文(五)	432
一、屈大均	432
二、唐甄	437
第二节 易代文人之文(六)	443
一、邵长蘅	444
二、王士禛	451
第六章 清代中期(一)	456
第一节 盛世之文(一)	457
一、戴名世	457
二、方苞	465
第二节 盛世之文(二)	473
一、刘大櫟	474
二、姚鼐	480

第七章 清代中期(二)	487
第一节 盛世之文(三)	488
一、郑燮	488
二、袁枚	494
第二节 盛世之文(四)	501
一、汪中	501
二、洪亮吉	507
第八章 清代中期(三)	513
第一节 盛世之文(五)	514
一、恽敬	515
二、张惠言	520
第二节 盛世之文(六)	528
一、管同	528
二、梅曾亮	533
第九章 清代后期(一)	539
第一节 近代之文(一)	540
一、龚自珍	541
二、魏源	547
第二节 近代之文(二)	553
一、曾国藩	553
二、黎庶昌	559
三、薛福成	563
第十章 清代后期(二)	569
第一节 近代之文(三)	570
一、康有为	570
二、章炳麟	577
第二节 近代之文(四)	583
一、林纾	584
二、严复	590

第三节 近代之文(五)	596
一、谭嗣同	596
二、梁启超	602
第十一章 余论	610
第一节 八股时文	610
第二节 骈体之文	613
第三节 日记之文	619
第四节 尺牍之文	622
后记	632

第六编 明 代

第一章 概 论

明代是个文章变化颇大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金、元两代之文，都是承袭宋代的儒学传统；这两代的文人，也多是儒生。其所制作，大抵都是“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王恽挽刘祁诗）。但明代之文，最初虽亦承袭宋代的儒学传统，而在以后的三百年间，文风屡变；到了晚明，便突破了这个传统，而别开生面。

明初之文承袭宋代的儒学传统，曾被看作“文章正宗”。黄宗羲在《明文案序》中所谓“有明文章正宗，未尝一日而亡”，即指这一传统而言。他还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也是说这一传统始终未断。

黄氏所谓“莫盛于国初”者，盖指明初宋濂、王祿等人的润色洪业之文；所谓“再盛于嘉靖”者，盖指王慎中、唐顺之等人的规唐拟宋之文；所谓“三盛于崇祯”者，盖指黄淳耀、艾南英等人的宗主归、唐之文。以这样的文章为正宗，也即是尊崇宋代的儒学传统。

这一儒学传统，在明代初期，是根深柢固的，突破实非易事。从李梦阳等前七子之反“台阁体”，到袁宏道等公安派之标举“性灵”，其间发展流变，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

明初之文，承袭这一传统，是十分明显的。《明史·文苑一》云：“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祿、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这里所谓“蔚然称盛”，主要是指宋濂等人继承了虞、柳、黄、吴的文统而言。这样的文章，今天看来，虽然不能称“盛”，却实具有明初之文的时代特征。

元季虞集、柳贯、黄溍、吴莱之文，都是“道从伊洛”、“文擅韩欧”

的。明初之文，沿此余绪，固是文章自身的发展，有其承前启后的嬗变规律。但与此同时，也因为这样的文章恰好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是和开国之君朱元璋的文教政策分不开的。

朱元璋以僧人、游丐而为天子，文化水平本来不高，但他开国前后，颇重儒学。早在至正十九年（1359），便“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经师”（《太祖实录》卷6）。于至正二十年（1360），“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世子受经学”（《太祖实录》卷8）。又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置礼贤馆”，当时“陶安、夏煜、刘基、章缙、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太祖实录》卷12）。《明史·儒林一》也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扰攘之际，所至征召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又设“制科取士”，“亦一以经义为先”。从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其崇尚儒学，至为明显。

但朱元璋之崇儒，不同于唐宗、宋祖，唐太宗优容大臣，宋太祖不杀言事之人。故唐初之文，颇多直言极谏；宋初之文，亦多言事论政。而朱元璋则不仅“雄猜好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2《胡蓝之狱》），“以文字疑误杀人”（同上，卷32《明初文字之祸》），而且对于文章写作，特多干预。这对明初之文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

朱元璋干预文章的事例甚多，其著者如开国之初，曾拟起建阅江楼，旋因恐遭天谴，又停工不建。但楼虽不建，却令群臣为楼作记。宋濂的那篇《阅江楼记》就是此时奉命写的。朱元璋看了宋濂等人所撰之文，都很不满，于是自作一篇，以为示范。其序云：“今年欲役囚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自谋将兴，朝无人谏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试令诸职事试为《阅江楼记》以试其人。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朕特假为臣言而自尊，不觉述而成章，故为序云。”在中国历史上，君臣唱和、应制写作的事例是不少的，但像朱元璋这样命题作文、鄙视群臣者，则是史无前例的。

朱元璋不仅鄙视时人之文，有时还挑剔古人之文。他对于韩愈、

柳宗元的文章都有评论。他有一次视察学校,看到学生有读柳宗元的《邕州马退山茅亭记》者,不以为然,便写了一篇《谕幼儒敕》,作为“指示”。其中有云:“盖于《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子之文无益也。”“其柳子厚之兄司牧邕州,构亭于马退山之巔,朝夕妨务而逸乐。斯逸乐也,见之于柳子赞美也。其文既赞美于亭,此其所以无益也。夫土木之工兴也,非劳人而弗成,既成而无益于民,是害民也。柳子之文,略不规谏其兄,使问民瘼之何如,却乃咏亭之美,……又于民何有之哉!何利之哉!其于柳子之文见马退山之茅亭,是为无益也。”朱元璋对于韩愈之文也有批评,他在《驳韩愈颂伯夷文》中有云:“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壮字奥且有音节者甚不寡,文全不诬妄理道者鲜矣。吁,难哉!朕闻儒者多祖韩文,试取观之,及至检阅,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过天地,小日月是也。”又在《辩韩愈讼风伯文》中有云:“吾观韩愈《讼风伯》之文,知其为人也,似乎欠博观达道理,格物致知犹未审其精。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钦天畏地,谨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为文,永无疵矣。”从这一系列的言论来看,朱元璋大概是要以其帝王之尊来指示“今之儒者”即当代文人怎样写作的。在这样的指示之下,文人学者“著笔之际”,就不得不以“至精之言以为文”,以免皇帝从中求“疵”了。

作为开国之君,日理万机,而干预文章写作竟如此具体,这是前史少见的。

明初几个作者如宋濂、王祎等人,作为“胜代遗逸”,本来都是善于润色洪业、讴歌盛世的。在朱元璋的政令指引之下,也就更加拘谨,秉笔写作,自然而为“盛世之文”、“治世之音”。其波澜意度,也自然更加步趋前辈儒者。清人论古文者,曾谓:“道源(虞集)、圭斋(欧阳玄)、潜溪(宋濂)、东里(杨士奇)诸公,虽学有浅深,熟烂则一。”(王应奎《柳南续笔》卷1《义门论古文》)把宋濂和前辈的虞集、欧阳玄,后辈的杨士奇相提并论,以为同样“熟烂”,可谓看透了明初之文沿袭元季儒者之文的传统特点。

还有,明初宋濂等人论文的主张,也大抵沿袭元季诸儒的余绪。例如徐一夔在《陶尚书文集序》中说:“国家之兴,必有魁人硕士乘维新之运,以雄辩巨笔出而敷张神藻、润色洪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使郡国闻之,知朝廷之大;四夷闻之,知中国之尊;后世闻之,知中国之盛,然后见文章之用为非末技故也。”这话是有代表性的。宋濂、王祎、贝琼、陶安、练子宁等人都有类似的想法。这样的看法也和朱元璋的政治需要比较一致。因此之故,明代初期,和历朝历代相比,便较早地出现了以宋濂为代表的“馆阁”之文,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之文。

从永乐到正德百年之间,为明代王朝比较兴盛的时期,这时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台阁体”。《明史·文苑一》云:“永、宣以还,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而气体渐弱。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这时的作者,前有三杨,后有李东阳,都是“馆阁”或“台阁”的作者。

这个时期产生“台阁”之文,和成祖永乐年间的文化统治也有关系。成祖朱棣,是朱元璋之后的一个有权有术又有作为的皇帝。对于文事之干预,亦甚具体。杨士奇《东里别集·圣谕录》曾有一段记述:“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读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罪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令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他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毁所著书最是。’”这一段记述,也见于《太宗实录》卷33,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记录了最高统治层的一项决策,对于士人著书之“谤先贤、毁正道”者,是看作“非常之罪”,不仅要“笞以示罚”,而且要“毁所著书”的。

《太宗实录》卷35还有一段记载：“（永乐二年十月）丁亥，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举奏：‘民有献文章者，往往辞义纰谬，辄敢上读。’上曰：‘尔欲罪之邪？彼之来，自谓至敬，但其才智只如此，不足责；可斥还之，亦以抑谀佞之风。’”从这一段记录看来，李至刚等阁臣，不仅曾经附和了天子的旨意，而且在文化政策方面，比天子还要偏激。

再有，永乐年间编撰《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书，也有胡广等阁臣参与（见《太宗实录》卷168）。而《永乐大典》的编撰，最初也是阁臣解缙倡议的（见解缙《大庖西封事》）。

朱元璋在惩治宰相胡惟庸之后，曾废宰相而不置。朱棣不置宰相，却充实了内阁学士。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历事四朝，“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7）。他们是参与了文化决策的。尤其是到了仁宗、宣宗之世，三杨的地位更高。史称“仁、宣之间，政在三杨”（《明通鉴》卷21）；赵翼说：“宣德正统间，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廿二史札记》卷33《明内阁首辅之权重》）在这个时期里，不仅朝廷大政为三杨主持，天下之文柄亦归三杨主持。“台阁体”之文即由此兴起。

台阁之文，主要盛于仁、宣之时。仁、宣两代，史称“治世”。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明史纪事本末》卷28《仁宣致治》）《明史·宣宗纪赞》云：“在位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数。”《明史·仁宗纪赞》云：“即位以后，更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休明，仓庾充羨，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明史》卷148《杨士奇传》亦云：“帝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这些记述，未必完全属实，但和明代其他历史阶段比较，应属太平治世。在洪武、永乐两朝政治高压之后，有这样宽松的社会环境，恰是台阁诗文得以繁荣滋长的条件。

在三杨之后，主持政柄和文柄的阁臣是李东阳。何良俊说：“弘